

蘇聯城鄉關係

潘公昭譯

柯錫列夫著



中外出版社印行

蘇聯城鄉關係

柯錫列夫著

潘公昭譯



中外出版社印行

蘇聯城鄉關係

著者 譯者 印行者 刊期

柯錫列夫
潘公昭
少年出版社
北京西長安街甲二三
一九四九年九月

· 權 · 版 · 有 ·

(平二) 1—2000

卷頭語

本書爲蘇聯著名經濟學家柯錫列夫 (K. Koshelov) 所著，原題爲「蘇聯怎樣克服城市與鄉村的對立」，刊登在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出版的聯共（布）黨中央委員會理論與政治性機關雜誌「布爾塞維克」第二十二期。

這篇專論，從鄉村與城市的本質，它們的發生和發展的歷史，從理論和事實上，分析在資本主義社會裡鄉村和城市的關係，以及鄉村爲什麼永遠落後於和從屬於城市，指出城鄉對立所引起的資本主義社會經濟的危機，以及爲什麼在資本主義條件下面，無法克服城市對鄉村的矛盾，無法克服工業對農業的矛盾。然後進一步說明，在社會主義的蘇聯，鄉村和城市關係有了怎樣不同的面貌和關係，城市與鄉村，工業與農業，工人與農民，是怎樣的結合起來，共同在社會主義建設事業上發揮積極的作用，而使國家向共產主義的道路邁進。

正在由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走上新民主主義生產建設大路的新中國，在城市和鄉村工作實行有機的配合而加緊推進的時候，對於蘇聯在這一方面憑工作與戰鬥的經驗所創造出來的理論和具體方法，毫無疑問的，這是非常值得我們重視、研究和參考的。所以，相信這本小冊子的出版，對於今天的中國人民，是合時和合用的。

在這裡應該提醒讀者的，就是：在蘇聯，是已經完成了社會主義的基本建設，而開始向

共產主義的理想社會邁進的時候了；在蘇聯，是已經完全消滅了人剝削人、人壓迫人的敵對階級，而新生的的是以工人爲主和集體農民與知識分子友好聯盟的新階級；在蘇聯，鄉村經濟在社會主義的經營之下已經走上電氣化工業化的大路；因此，今天蘇聯的城鄉關係，自然不可能拿來和中國相提並論的。我們所要注重的是蘇聯今天正向理想大路邁進的城鄉關係，是沿着怎樣的路線發展而來的；我們所要注重的是蘇聯會怎樣勝利地克服城鄉對立的理論和技術。在這一方面，柯錫列夫氏這篇作品，對我們是有益的。

譯者 一九四九年五月

目 錄

卷頭語

- 一、城鄉關係的基本認識
- 二、蘇聯城鄉關係的主要特點
- 三、從「面向農村」到「面向城市」
- 四、農業機械化和電氣化的成果
- 五、工業和農業生產力之合理的配置
- 六、工農生活水準的一致提高
- 七、蘇聯城鄉關係的新面貌和新內容
- 八、走向共產主義大道的蘇聯城鄉關係

一 城鄉關係的基本認識

克服城市和鄉村之間的對立，是建設共產主義社會的一個基本任務。城市和鄉村之間的對立，從它在私有財產制度的基礎下發生起，一直到敵對階級社會趨向崩潰為止，在這整個期間，都會深入地存在，而在資本主義時代，則更達到極度對立的階段。城市和鄉村的對立，是資本主義制度的一個最深刻的矛盾。

準備了和實行了偉大的十月社會主義革命的，列寧——斯大林的黨，爲着消除工業和農業，城市和鄉村間的對立，確定了切合實際的路線。

布爾塞維克黨在一九一九年的第八次大會上，所通過的綱領裡，曾經規定：

「考慮到城市和鄉村之間的對立，是農村經濟與文化落後的一個最深刻的根源，而在目前這樣進入深刻的危機的時期，則無論是城市也罷，鄉村也罷，都將直接的面臨衰落和滅亡的危險。蘇聯共黨因把消除這個對立，作爲共產主義建設上的基本任務之一。……」

爲着消除城鄉之間的對立，需要有相當長的時期。這個任務的實現，要求把小規模的零碎經營的農業，在共同的合作的生產方式的基礎上加以改造，使農業在最新型的機械化的基礎上澈底的改裝，把農業勞動轉變爲工業勞動的「變種」，（即使農業勞動變爲另外一種工

業勞動），提高鄉村居民的物質和文化水準，達到社會主義城市居民的水準。

在社會主義建設的年代，在戰前斯大林五年計劃年代，我國開始成爲強大的工業國家。小農經濟已經過渡到集體農莊經營的道路。在合作農耕的基礎上面，用第一流技術裝備起來的農業勞動，已經變成工業勞動的「變種」。由於社會主義在城市和鄉村裡面，在工人階級和農民羣衆聯盟上的得勝，由於工人階級在這裡發揮重大的作用，這個聯盟是鞏固起來了；工人階級和農民，成爲人類歷史上空前未聞的一個完完全全嶄新的階級，成爲互相友好的階級，他們之間的界域，是一天一天的趨向消失了。曾經長期存在的城市和鄉村的對立，已經從根本上開始粉碎了。澈底消滅城鄉對立的這個任務，在由社會主義過渡到共產主義的過程中，將要完完全全的實現了。新的——戰後的——斯大林五年計劃，爲了完成由社會主義逐漸過渡到共產主義這個任務，向前邁進了重大的一步，在這一步上，也包括着消除城市與鄉村之間的對立這一個任務的。

城市和鄉村之間的對立，有過好幾世紀的歷史。它是在人類社會由原始社會制度過渡到奴隸社會的時候發生的。到了後來，當一個社會經濟階段過渡到了另一個階段的時候，物質生活的生產方法是改變了，城市和鄉村的相互關係是改變了，但是它們之間的對立却繼續存在，因爲它的社會經濟根源——對於生產資料的私有制度，社會分裂爲敵對的階級，以及跟「人剝削人」的關係結合着的勞動之社會性的分割，還是原封不動地保留着。

資本主義更加擴展了和深化了城市和鄉村、工業與農業之間的對立。

馬克思和恩格斯曾在「共產黨宣言」裡很明白地指出，在資本主義條件下城市與鄉村對立之尖銳化和深刻化的特點：

「資產階級使鄉村服從城市的統治。他創造了大城市，使城市居民比較鄉村有了高度的增加，並因此使它們大部分的居民脫離了農村生活的愚昧。正像它使鄉村從屬於城市那樣，它使野蠻的和半野蠻的國家從屬於文明國家，農業國家從屬於工業國家，東方從屬於西方。」

在布爾喬亞制度的條件之下，資本主義的城市，全面地統制了鄉村，使農村的勞動羣衆被逼陷於不堪忍受的困苦的地位。在資本主義制度之下，農業有系統地落後於工業，農村日益落後於城市，使它們之間的對立日益深化和嚴重。資本主義的鄉村，成爲經濟文化落後的典型，而爲替資本主義城市供應原料的附庸。在這裡用資本主義的和半農奴的形式，對鄉村勞動羣衆實行剝削。在帝國主義（資本主義的最高和最後階段）的條件之下，工業與農業之間城市與鄉村之間的對立，顯得特別嚴重和深刻。在帝國主義時代，資產階級的城市，經過銀行的手，採用工業產品高度壟斷價格的方法，採用直接及間接捐稅和一切徵役的方法，向鄉村從事掠奪。在資本主義的條件之下，鄉村爲佃租和爲購買土地而對大地主支付巨額的款項。資本主義的鄉村，又被吸血的高利貸的網羅所圍繞了。

資本主義國家的基層的農民羣衆，爲窮乏所絞殺，他們不得不滿足於原始的技術，用太古時代的方法從事耕種。這更使土地無窮盡地趨於貧瘠。

資本主義國家的小規模的農業經營者，只能靠了極度緊張的勞動和嚴格的節約消費，才得保持其自主與獨立的存在。這些農民所保留的「只是可怕的低劣的消費和困苦，以及加倍的勞動。」（列寧語）。

資本主義不僅使鄉村從屬於城市的統制，而且使殖民地和半殖民地成爲工業發達的資產階級國家的原料的附庸。在帝國主義時代，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上居住着全地球半數以上的人，按照他們對於資本主義工業國家的關係來說，發生了巨大的「世界規模的鄉村」的作用，壟斷資本家從這裡榨取了全部的脂膏。

農業對工業，鄉村對城市之有系統的落後，是資本主義經濟崩潰的最深刻的起因之一，也是經濟危機與物價高漲的深刻的起因之一。農業對工業的落後，並不是天然因素所引起，而是由於資本主義的生產關係，由於它使生產手段成爲私人所有。土地的私有制度，以及由此而發生的絕對性的地租，成爲提高農業生產力的、成爲消除農業對工業鄉村對城市之落後性的最大的制動機。它妨礙了將新的技術注入農業，轉移資金到土地的購買上面去，阻止將這些資金運用在農業生產方面。

土地的私有制度，構成了這樣的條件：一方面是農業方面龐大的資本主義經營者的增加

，另一方面是屬於小農戶零碎經營的土地之不斷的粉碎，以致農業對工業，鄉村對城市的落後性日甚一日，使它們之間的對立日益深刻。

農業的危機，由於資本主義在農業上發展的本質，而帶有延長的特性，使小農陷於破產。在資本主義體系總危機時期，這種危機顯得特別嚴重，以致耕種土地面積劇烈縮小，土地耕種方法更加惡化，技術化趨向停滯，工役與義務勞役制度更加擴張。

資產階級在提高農業生產力的事業上顯示其完全破壞，他保持了封建的土地貴族在農業上的統制地位，給鄉村勞動大眾造成了極端困苦的條件。

十月社會主義大革命廢除了對於土地、作坊、工廠、鐵路及其他生產手段的私有制度，把它改成社會公有的，國家所有的制度，成爲全體人民共有的財富。正是這個制度，替國家的工業化與農業的合作經營，替城市與鄉村之間對立關係的消除，創造了先決條件。

二 蘇聯城鄉關係的主要特點

由於十月社會主義大革命勝利的結果而誕生的蘇維埃政權，一舉而將從前屬於大地主的修道院和教會的土地——一億五千萬俄頃（Desyatina，合一〇九·二五英畝）無價地交與貧農和中農們，使從事耕種，使勞動農民從那些為購買及租賃土地而必需繳付的消費中拯救出來。

由於土地國有化及其在貧農中農之間實行再分配的結果，由於工人階級對勞動農民用盡各種方法加以幫助的結果，早在蘇維埃政權成立的第一年內，農村裡面已經出現了極大的轉變：地主這個階級已經完全消滅了，富農這個階級在農民中的比重減少了三倍，貧農的比重則減少了差不多兩倍，而中農的比重則增加了三倍。中農變成農業方面的重心，形成鄉村裡的優越的勢力。主要的農產品在歷史上第一次屬於生產它們的貧農和中農。他們也成為大量作為商品的農產物的主人。

「這就是說：小農和中農從地主的桎梏下完全解放出來，並且在基本上粉碎了富農的勢力之後，他們有可能以嚴格的方式來改善自己的物質生活。這是十月革命的結果。這裡首先說明：這是基本的農民羣衆在十月革命裡所獲得的決定性的勝利。」（斯大林：「列寧主義

問題」第十一版俄文本第一八六頁)。

在無產階級專政的條件之下，城市和鄉村之間的對立，逐漸地趨於消滅。在蘇維埃制度裡面，工業與農業、城市與鄉村之間，並不像兩個敵對的和不可調和的勢力而彼此對立的，它們之間並不存在統治與被統治的關係，並不存在敵對的矛盾。工人階級是蘇維埃社會的主要的勢力，在列寧——斯大林黨的領導之下，和勞動農民聯盟，實行農業上的社會主義的改造，消滅城市和鄉村之間的對立。

農村的發展，在資本主義的條件之下，和在由資本主義向共產主義的過渡之中，規定了城市統治國家的特質。鄉村不能不跟城市共同前進。當社會還保持階級的要素的時候，在城市和鄉村之間，是不可能實現平等的。

「這是在資本主義條件下完全不可避免的事實。特別是在由資本主義過渡到共產主義的時候。」

「城市不能與鄉村平等。在這個時代的歷史條件之下，鄉村也不能和城市平等。城市不可避免的要領導鄉村。鄉村不可避免地要向着城市前進。問題只在這裡：即「城市」階級裡的那樣的階級來統治鄉村，怎樣完成這個任務，和用怎樣的方式進行這個城市的領導。」（「列寧選集」俄文本二十四卷六三四頁）。

在資本主義的條件下面，鄉村處於對城市，對工業，對信用貸款，對政權的附屬者的地

位。而在城市裡，政權和生產手段是掌握在資產階級的手裡的，所以城市和鄉村之間的相互關係，是城市對鄉村的剝削關係。在資本主義條件下，鄉村只能按照資本主義的道路發展，這就引起農民的階級的分化——一方面是資本主義的農場的擴張，另一方面是無產階級和貧民的增加。這是在資本主義下面鄉村發展所不可避免的道路。

「在我們的國家，農民經濟的發展是否必須按照這條道路發展呢？我國的城市具有完全不同的面貌，工業掌握在無產階級的手裡，運輸、信貸制度、國家政權等都集中在無產階級的手裡，而土地國有化已是全國通行的法律。那麼，當然不必了，相反的，正因為城市是鄉村的領導者，而在我國城市裡統治一切的，又是掌握着國民經濟一切命脈的無產階級，正因此，農民經濟就應當按照另一條道路去求其發展，按照社會主義建設的道路去發展。」——斯大林同志在一九二六年就這樣說過。（「列寧主義問題」俄文本十一版，一四八——一四九頁）。

在資產階級生產方法這個條件之下，鄉村之跟着資本主義的城市跑，是盲目的，無計劃的，是按照資本主義城市的形式和類型改造的。這個是由資本主義城市和小農經營農業的本質，是由資本主義生產方法的本質來決定的。資本主義工業和小商品農業在基本上是和自己成爲一類型的，因爲無論是哪一種，都是奠基於生產手段的私有制上面的。

小農經營，基本上是和資本主義經營屬於同一類型，但和社會主義的城市生產並不同型

，因爲在基本上，社會主義的城市的生產，是奠基於社會主義的公有制度上面的，而在小農經營的基礎上面，則是建基於私有財產制度上面的。所以，小農經營的鄉村，不可能自動地自然而地走向社會主義的城市。斯大林同志說過：社會主義城市應該幫助小農經營的鄉村走上使個人的農業改造爲合作的共營的道路。「……爲了使小農鄉村跟着社會主義城市走，除其餘一切而外，還須在農村裡培植巨大的社會主義農莊，以蘇維埃農莊和集體農莊的形式，作爲社會主義的根據地，強有力地引導基本農民羣衆到自己這方面來，跟着社會主義城市前進。」（斯大林：「列寧主義問題」俄文本十一版二八〇頁）

鄉村發展的社會主義的道路，保證農民勞動羣衆的根本而切實的權利，鄉村勞動羣衆的血肉相關的權利，只有這樣的方法，即是將農業在社會主義的基礎上加以改造，在鄉村裡擴展合作方式的經營，才能獲得滿足。「人民最迫切的經濟要求，曾經必須按合作化的方法加以改造。而布爾塞維克黨就是在斯大林的領導之下，正確地實施了這個迫切的經濟要求，知道怎樣使千百萬農民羣衆走上合作化的道路。」（斯大林略傳，一一五頁）

布爾塞維克黨和蘇維埃政權，利用了經濟上的指揮者的地位，幫助農業開始走上社會主義的發展的道路，走上了集體農莊的道路。

蘇維埃國家從它出生的第一天起，就確定了社會主義工業和小農經濟之間的相互關係。集中在城市裡的社會主義的產業，反轉來「面向農村」。變成使農業實行社會主義的改造的

有力的因素，克服城市和鄉村之間的對立。

在資本主義條件之下，工業的發展，以及爲此而進行的國內市場的構成，是要經過基本的農民羣衆的破產而實現的；因此加深和激化了城市和鄉村之間的矛盾。在蘇維埃國家，爲着社會主義工業之發達的國內市場之建立，是採取提高城市與鄉村勞動羣衆之福利的辦法的。所以，蘇聯的工人階級和農業勞動羣衆，對於國家的工業化，都是血肉相關地重視的；工業使全部人民經濟奠定了最新的技術的基礎，爲生產力之暴風式的發展，爲全體人民的物質生活與文化生活之不斷的提高，創造了前提條件。

黨和蘇維埃政府，完成將小規模的個人經營的農業，爲在社會主義的基礎上實行改造的任務，決定採取澈底實現列寧斯大林的合作計劃的辦法，使農業從運銷與供應的合作制，提高到生產的合作化，集體農莊的合作化。這個計劃，已經在和富農及其代理人——托洛茨基、布哈林派及其他社會主義敵人們進行最劇烈的階級鬥爭之中實現了，那些人是企圖按照資本主義的方法去發展農業的。

布爾塞維克黨使列寧斯大林的「國家社會主義工業化」與農業集體經營的政策，完全付之實施，克服了富農及其代理人托洛茨基與布哈林份子的反抗，在全面的集體經營的基礎上，獲得了集體農莊制度的勝利，並消滅了作爲一個階級的富農。集體農莊制度的勝利，展開了農業生產力迅速發展的道路，展開了農業勞動者之福利不斷提高的道路，創造了完全消滅

城市與鄉村對立的條件。

三 從「面向農村」到「面向城市」

在集體農莊制度成功以前，蘇聯的國民經濟是建立在兩個不同的基礎上面的：建立在消滅了資本主義因素的社會主義工業的基礎上，也建立在產生資本主義因素的小農經濟基礎上。這種情形。可能使蘇聯的社會主義建設事業趨向破滅。

斯大林同志說過：「……不能只在工業方面建設社會主義，而聽憑農業去自發地發展，以爲農村自然會跟着城市走。城市裡社會主義工業的存在，是農村裡社會主義改造的基本因素。但這還不是說，這個因素是完全足夠的。爲要使社會主義的城市能够引導農民的鄉村到底，就必須依照列寧所指示的：把全國經濟，包括農村在內，轉移到新技術基礎上，轉移到現代化的大生產技術基礎上。」（斯大林：「列寧主義問題」俄文本十一版二〇七頁）。

小農經營的弱點，在於它不能利用進步的技術、拖拉機、機械、農業科學上所獲得的成就，它不僅不善於在擴大的基礎上發展，而且還不是經常可能實行簡單的再生產。這是鄉村落後於城市、農業落後於工業的一個基本原因。

集體農莊對個體農莊的優越，就在於：集體農莊是農業上的巨大的社會主義的企業，利用新的技術、農業科學的材料，按照計劃，按照擴大的社會主義再生產的原則而發展，具有

高度的商品化標準，而其收益也一年比一年的增加起來。

農業上巨大的社會主義生產，是消滅城市與鄉村對立的最重要的基礎。靠着貧農中農業的集體化，蘇維埃農莊的建設和拖拉機配給所的組織，在我國創造出世界上最巨大的農業。這是黨和蘇維埃政權在農業上的巨大的全世界的歷史性的勝利。

斯大林同志指出第一個五年計劃中集體農莊與蘇維埃農莊建設成功的特點說：「你們只要想一想：在區區三年以內，我們就創造了二十餘萬個集體農莊和五千左右的蘇維埃農莊，即創立了完全新的大企業，這種企業對於農業的意義，也如大小工廠對於工業的意義一樣重大。請你們再指出一個國家，說它能在三年內創立若干新的巨大企業。姑且不說二十萬零五千個，就是二萬五千個也好。你們一定指不出來，因為世界上沒有這樣的國家，而且也未曾有過這樣的國家。」（斯大林：「列寧主義問題」俄文本十一版三八三頁）。

集體農莊和蘇維埃農莊，是農業在巨大的生產的基礎上實行改造的根本，是農業勞動機械化的根本，把它轉變為生產勞動的「變種」。在集體農莊和蘇維埃農莊的基礎上改造了的農業，變成國民經濟上最先進的一個部門了。

由於集體農莊制度勝利的結果，我們的國民經濟開始在統一的社會主義的基礎上發展了，以前，當集體農莊制度還沒有勝利的時候，社會主義的生產關係，只有在城市裡，才佔有支配的地位。自從農業勞動羣衆轉向集體農莊的道路以後，在全國奠定了社會主義生產關係

的統一的類型，奠基在同志性的合作與社會主義的互助勞動上面。所有這一切，引起了這樣的結果：即是農業在其一般的形式上，開始和社會主義工業成爲同一的類型，而農業勞動也一天比一天更加轉變爲工業勞動的「變種」了。

在農業實行社會主義改造的年代，同時也開始實行使舊的和新的形式聯合起來，那時的工業，開始保證集體農莊農民獲得生產上的需要，向鄉村提供農業用的機械、拖拉機、肥料，開始幫助鄉村在社會主義的基礎上實行農業的改造。農業生產在集體勞動和新技術基礎上的改造，使得農業有可能克服其數世紀以來的落後性，使它趨向工業的迅速發展的水準，使工業與農業生產增加的類型顯著地接近了。

農業的集體化，使農業勞動的本質發生根本的轉變，劇烈地提高了它的生產力。

小農的個人勞動，使農民們彼此隔絕，排除了生產內部的勞動分工，排除了前進的技術和科學，每一個人都不得不担負起一切種類的勞動，做了這一種勞動又得做另一種勞動。這樣就排除了專業化，阻礙了勞動生產力的增長。

在集體農莊裡，勞動已實行分工和專業化。這一個集團農莊莊員集體從事於耕作，另一個集團從事於畜牧，第三個集團則從事於建築等等。自然不說也很明白，勞動的分工制，也就在這個基礎上增大了工人的專業化，他們的勞動的合作制度，必然會提高勞動的生產力。集體農莊使農民有可能統一自己的勞動，利用第一流的技術，使勞動生產力提高了好幾倍，

使穀類和其他農業生產品的生產成本減低，大大地提高了農民的購買力。

集體化使城市與鄉村之間的關係從根本上改變了，城市與鄉村之間的對立，開始以劇烈的速度洗刷了。

「這個情況——斯大林同志說——對於我們整個建設工作有極大的意義，同志們。它改變着農民的心理，使他們面向城市。它造成消滅城鄉對立性的條件。它造成一種基礎，使黨所提出的「面向鄉村」的口號，將由集體農民所提出的「面向城市」的口號來補充。」（斯大林：「列寧主義問題」俄文本十一版二八七頁）。

城市在資本主義的條件之下，對於鄉村只能發生一種腐化的影響，使鄉村的政治、經濟和道德趨於墮落腐敗。因此，在資產階級國家，日益增長起農民勞動羣衆對城市的憎惡心，把它看做對鄉村的榨取者和壓迫者。

社會主義的城市對鄉村的生產上的幫助，澈底改變了農民對城市的關係。如果說，在資本主義的條件之下，農民對城市只有仇恨，把它看做是掠奪者，那麼，在集體農民却把社會主義的城市看做是一種力量，一種保證它們獲得生產上幫助的力量，一種提高他們物質和文化生活水準的力量。

在資本主義的生產方法的範疇裡面所實現了的——勞動的一般的分工和生產的統制，使工業勞動和農業勞動趨向完全的分裂。工業勞動被放在生產集中化和最新的技術的基礎上面

。農業勞動則被保留在分散的狀態，放在原始的古老的技術基礎上面。農民的勞動和農業勞工在技術裝備思想方面，和產業工人的勞動，相差很遠。在資本主義國家，小農和中農佔有農業居民羣衆中壓倒的多數，而在發達較爲遲緩的資本主義國家，全體居民中佔壓倒多數的人民，幾乎還不知道機器和不能在自己的業務上使用機器；他們的業務完全是靠着自己的一雙手。甚至在巨大的資本主義的經營上，對於最新式的機器的使用，也大大地落後於工業部門的大企業。

小農經營之在集體農莊基礎上的改造，和蘇維埃農莊的創造，他們的最新技術的裝備，保證了使農業勞動接近工業勞動的前提條件。我國集體農莊農民和蘇維埃農莊工人們的技術裝備，和資本主義國家的農業勞動者與農民們的技術裝備，是不可同日而語的。在我國，農業勞動已經按照生產全面機械化的方法，而變成工業勞動的「變種」了。

布爾塞維克黨和蘇維埃政府，以最快速度創造了強大的社會主義的重工業，推進了一切種類的機械製造工業，表現了和表現着對於集體農莊與蘇維埃農莊生產過程機械化的不知疲勞的關心，對於提高農業勞動生產力和使它轉變爲工業勞動之變種的關心。

在戰前的斯大林五年計劃的時期，蘇維埃國家在巨大的社會主義農業生產方面，奠定了強大的技術的基礎，終結了數世紀以來農業在技術經濟上的落後性。

在農業勞動技術化的程度上，我國已經遠遠地超過了美國，而美國農業技術化的水準，

則高出其他資本主義國家。蘇聯的集體農莊，在一九四〇年，已經有全部耕耘的四分之三和全部播種的半數以上使用自動耕耘機，耕地面積半數以上的收穫使用收割聯合機；而當時——一九四〇年——在美國，只有一半的耕耘和三分之一的播種是使用自動耕耘機的。在衛國戰爭前夕，蘇聯的農業方面，每一種自動耕耘機，比起美國的農業來，其利用的效率超過了五倍。蘇聯的農業，在技術上的改造基本上已經是完成了，工業和農業之間的勞動機械化過程的分歧是一天比一天減少了。

四 農業機械化和電氣化的成果

小規模的被分割的農業，在社會主義的基礎上實行改造，耕種機械分配所在這裡成爲克服城鄉對立的，最強有力的因素，它使集體農莊的勞動，在最初的農業技術的基礎上實行全面的機械化。他們號召起集體農莊的農民羣衆的主動性，在有組織的技術的幫助之下，在社會主義國家的領導之下，在巨大的集體經營的建設事業上面聯合起來了。

農業機械分配所是蘇維埃國家在集體農莊生產機械化事業上的支撐陣地，是屬於國家的生產工具（自動耕耘機，收割聯合機及其他機器）在集體農業上加以合理地利用的基礎。

在我國的農業方面，在斯大林五年計劃期內，實現了真正的技術革命，它澈底地減輕了集體農莊農民的勞動，和好幾倍地擴增了這種勞動的生產力。使用自動耕耘機的耕種，提高勞動生產力達六至十倍。這裡又大大地改善了勞動的性能（如深度的耕耘等等）。在穀類的收穫工作上使用收割聯合機自動耕耘機，較之個人農業經營，其勞動生產力要高出好幾十倍。使用收割聯合機的收穫可以減少穀類的消耗達十倍乃至十倍以上。

農業在最新技術基礎上實行社會主義的改造，並使農業勞動轉變爲工業勞動之「變種」，其最重要的環節，就是全體的機械化，是和彼此補充的機器的創作體系密切地聯系着的。

戰後的斯大林五年計劃，規定了關於農業更加機械化和鞏固農業機械分配所之技術基礎的巨大的任務。農業方面在五年計劃內獲得不少於三十二萬輛的第一流強力的自動耕耘機及其他農業機械，計達四十五億盧布，在第二個五年計劃中則爲十九億盧布，而在當時，這已達到農業機械與自動耕耘機生產的最高水準了。組織起九百五十所聘有當代著名技師以便修理的農業機械供應站。此外，爲耕耘機分配所服務的機械修理廠的機器廠的數目，也擴增達二百十所，而自動耕耘機大修理廠達五百十所。耕耘機分配所的生產技術基地，在五年計劃的終結時期，將要比較一九四〇年更加強大有力。

在農業機械化的部門，完成了極重要的本質上的變革。在生產中廣泛地輸入最新的，更加改良的各式農業機械，自動耕耘機、土壤加工機、播種與收割機、自動收割聯合機、帶冇去葉除殼等特種裝置的收割聯合機、甜菜收穫用聯合機、甜菜裝載機、棉花收穫機、蔬菜耕種與收穫機、收種子用蔬菜類耕種機、懸吊農業機械及自動耕耘機的工具。

蘇維埃國家有系統地鞏固農業上的技術基礎。莫洛托夫同志在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六日的報告中說：「農業在這一年從政府方面獲得比戰前時期——比一九四〇年三倍以上的自動耕耘機，二倍以上的汽車、二倍以上的農業機械。政府實行着新益求新的設施，以期用一切方法提高農業的技術基礎，減輕集體農莊農民的勞動，和提高他們的勞動的生產力。」

奠基於農業機械分配所的機械技術基礎上面的集體農莊勞動的機械化，一年快如一年地

使農業勞動轉變爲工業勞動的「變種」。集體農莊裡使用更加完成的機械和生產電氣化所造成的鄉村更進一步的富足，是農業勞動機械化的完成和農業勞動日益轉變成工業勞動「變種」的前提條件。

我國在斯大林五年計劃期間，創造起強大的電氣工業，這是農業生產全面機械化過程的基礎。現在我國已經到處配置有農業電氣化所必要的一切了。按照斯大林同志的創意，在布爾塞維克黨和蘇維埃政府的領導之下，從一九四五年開始，普遍地進行了爲鄉村電氣化的鬥爭。

在戰後五年計劃中，規定「集體農莊，農業機械分配所和蘇維埃農莊的電氣化，保證其更進一步的發展。擴展各鄉村裡的小型發電所的建設，在沒有水力發電資源的地區，則使用移動機關車和燃料養化機，利用當地燃料實行火力發電。」在戰後五年計劃中實施的小型水力發電站的能力，計達一百萬基羅瓦特。

巨大的社會主義的農業，保證了無限制地利用電力的可能性。農業的電氣化，得以將更加完成的技术灌輸入農業方面，保證農業勞動生產力更加提高，使農產品更臻豐饒。農業的電氣化，促進鄉村在生產力和文化方面更加提高而達到城市的水準。

在戰後時期，農業電氣化事業方面，已經獲得重大的成功。早在一九四五年，集體農莊的電氣化已較一九四〇年增加三倍半，而農業機械分配所則增加了十倍。到一九五〇年底，

農業電力化，將增加到二百萬基羅瓦特，而一九四五年則為二十六萬九千七百基羅瓦特。到五年計劃終結之時，全部蘇維埃農莊，農業機械分配所和七萬個集體農莊將實現全部電化。

蘇聯農業方面的生產的社會化，集體農莊和蘇維埃農莊對於最新的第一流技術的利用，將有可能在社會主義農業裡面，施行進步的農業科學，創造合理的農耕的制度，提高土壤肥沃和勞動生產力。這在將土質改良的輪流播種的科學的創造介紹入集體農莊和蘇維埃農莊，提高穀類收穫和耕種技術，以及農產品質的改良，具有切實的影響。改良土質的輪種方法的大舉注入使我們的農業變成國民經濟裡面高度集約的部門。按照戰後五年計劃的任務和聯（布）黨中執委會大會的決定，改良土質，輪種制應該灌注入全部集體農莊和蘇維埃農莊共。

改良土質的循環播種制規定農業生產的計劃化，它的一切部門的計劃化。這樣的任務，只有在社會主義制度的條件之下才能實現。資本主義的農業，取決於市場的景氣，不可能實行要求計劃農業的改良土質的循環播種。資本主義的農業的發展，便完全不同，它只能按照狹隘的專業化的方法，按照適應市場需要而從事耕種生產的方法。

資本主義不可能合理地發展農業，它掠奪性地利用土地，一貫地破壞了土地的肥沃。現在美國，進行着土地肥沃程度不斷減少的過程，廣闊的地區變成不堪耕種的荒漠。早在二次世界大戰前夕，美國領土上差不多有半數遭遇狂暴的砂雨，消滅了大部分土壤的肥沃層。這是一個明顯的證據，即科學地從事的農業，是和資本主義的體系不能並存的。在這道路上橫

互著的障礙是生產手段的私有制度，和資本主義的本色——生產的無政府狀態與競爭。在我國，情形就完全不同。在蘇聯，農業的合理的處理，是和社會主義的生產關係，是和社會主義的本質，經濟的有計劃的發展等等不能分離的。全國的工業化和農業的集體經營化，開始確定了蘇聯的合理的農業經營，從根本上改變了我國農業發展的性質。這樣就可以將最新的技術和最進步的農業科學利用到農業上面，提高穀類和加工農產物的收成，把以前在農業上貧瘠的土地變得肥沃了。在中亞細亞的幾個共和國裡，在廣大的面積上組織起灌溉的農業，給與大地提高棉花及加工農產物收成的可能性。沼澤四佈的土地，也成爲肥沃的原野和牧場了。實行灌溉和改良工作的土地，已在我國一年一年的擴大了。它對於農產品生產的增加，對於農業生產力所達到的繁榮，對於農民生活水準的提高，具有巨大的意義。

蘇維埃國家對於發展農業生產力，表現其不知疲勞的工作。最明顯的表現，就是一九四八年十月二十四日所發表的部長會議和聯共（布）黨中執委會：「關於在蘇聯歐洲地區爲保證草原和林野的高度與穩定的收穫，而從事於循環播種制的實施、池塘儲水池的建築等，保障耕地栽培森林計劃」的決議。

按照斯大林同志的創議而通過的改造自然界的巨大的計劃，是要在任何條件之下達到高度和穩定的收成。這個計劃的實施，把我們的社會主義的農業提高到新的無限量的更趨高度的階段。

莫洛托夫說：「計劃的目的，是在那樣地利用所有巨大的出色的經驗和農業科學上的造詣，使草原和林野的蘇維埃農莊與集體農莊，都能運用進步的技術裝備起來，在最近的幾年裡面，對於農業和畜牧更進一步的發展，實行真實的飛躍。」

黨和政府關於保障耕地栽培計劃的歷史性的決議之實施，在爲提高農業生產力的鬥爭上，在爲更進一步改善勞動者福利的鬥爭中，發生着巨大的作用。

五 工業和農業生產力之合理的配置

在資本主義的條件之下，城市與鄉村之間，工業與農業之間的矛盾深刻化和嚴重化的原因之一，就是生產力之不合理的和不平衡的配置。資本主義所特有的生產力發展上的不平衡的性質，表現在一個地區是成爲工業的，而另一個——則是農業的；一個地區被確定需要農產品，而另一地區則生產這些產品。

工業被集結在少數大城市，和原料的產地隔離着。將生產力作這樣的配置，就必然使城市和鄉村之間，宗主國與殖民地之間的鴻溝，更加深刻了。殖民地表現其對帝國主義國家作爲農業原料供應者的性格。少數發達了的資本主義國家，和經濟文化上極其落後但擁有龐大的領土與人口的殖民地國家，互相對立着。資本主義產生了畸形的經濟特殊的發展的地區，引起了這一地區的經濟發達和別一地區則爲之衰頹。資本主義國家內經濟上的專業化，具有片面的、單邊性質。農業上的極端狹隘的專業化，偏重於對壟斷資本家可獲巨大利潤的某一種農產的生產，就會使土地趨於貧瘠和使鄉村勞動羣衆的生活水準不斷的下降，殖民地的農

民遭受這種苦難更爲慘重。

在沙皇俄羅斯時代，工業被集中其壓倒的優勢在中央各省，遠離原料供應地區。邊疆則成爲中央工業區域的工業原料的附屬品。在邊疆地方沒有工業發達的城市，產業，無產階級，鐵路，而農業居民則有最大多數的羣衆在自然經濟中，和市場，和城市，和工業，都沒有關聯，因而大部份的居民羣衆都過着游牧的和半游牧式的生活。爲着保證克服城鄉對立的條件，曾經必須在全國各農業省分創造起來工業的基地，在那裡培養出工人階級，把農民團結在他們的周圍，在巨大的社會主義生產的基礎上，改造農業。這任務只有蘇維埃政權能夠實現而且已經實現了。蘇維埃國家消滅了生產力配置方面的、由資本主義方面承襲下來的缺陷。

斯大林同志指示出工業、農業、農業產品與部門上專業區的正確配置的重要意義，確定了完成這個任務的方針。在社會主義建設時期，就在我國東部和北部、在我們祖國遙遠的邊疆，建立起許多工業基地。在戰前的五年計劃時期，成長起三百六十四座新城市，這是社會主義工業的支撐基地。

在我國，順利地實行着按照農產物和部門的農業上的專業化，這些是不可能在小規模的、個人經營的農業條件之下施行的。

「很明白——斯大林同志說——在小農經營的條件之下，嚴格地實行專業化是不可能的

，因爲小規模的經營，經濟是不安定的，被剝奪了必要的蓄積，不得不分割自己所有一切農產物，以期有機會拋出一種產物而可能換得別的一種。」（斯大林：「列寧主義問題」俄文本第十版第四百頁）

農業上主要部門的正確的配置，農業生產按照農產物和部門而實行專業化，保證有可能利用各地區的有利的土壤和氣候條件，而生產爲我國所必需的這種和那種農產物。以前在中央和北部地區的農業上，穀類特別是小麥，因爲在各該地區獲得有利的條件，佔有相當的地位。在我國的南部，只有小規模地栽培些亞熱帶的農產品（茶、橡膠樹、蜜橘、棉花等等）。所有這一切都只是不合理地利用着土壤和氣候的條件，阻礙了農業生產力的發展和鄉村勞動羣衆福利的上昇。集體農莊制度才創造了使農業按照農產物與部門、實行科學的創造性的專業化的前提。在這種專業化的基礎之上，成長和鞏固着集體農莊的鄉村，提高着集體農民的收入，鄉村得以進向城市的水準。

生產力之社會主義的配置，工業大工廠和原料供應地的接近，按照農產物和部門的、地區的專業化，消滅了工業和農業之間的部門的界限。現在我們這裡已經不再存在例外的沒有自己的糧食與原料基地工業部門，正像在我們這裡已經不再存在只向工業部門提供食糧產品的農業一樣。我國所有一切產業部門，日益固定於工業，而同時每一部門也都具有它自己的糧食基地。以前在莫斯科地區是消費區，它沒有它自己的發展了的農業

現在，莫斯科

已經具有自己的發展了的商品化的農業。

由於全國各地區的工業化和在每一個省分都擁有自己的糧食基地，工業直接和糧食與原料產地相接近，農業得以面對工業作為鞏固自己的物資與技術基地的穩定的支柱，工業和農業，城市和鄉村居民平衡地分布於全國。由於工業和農業的儲備品更加合理的利用，進行了城市和鄉村趨於接近的過程，消滅了它們之間的對立。

六 工農生活水準的一致提高

黨和蘇維埃政府在克服蘇聯城鄉對立方而獲得成功的最重要的證據，是城市和鄉村勞動羣衆的物質與文化水準之同樣的迅速的提高。

在資本主義方面，其特點是鄉村之不斷的分化，一個極端是富農階級的增加，另一極端是貧民和無產階級的增加，農業基本羣衆生活水準的無限制的降低。農業居民的飢餓，是資本主義的不可逃避的衛星。

集體農莊制度在每一個農民的面前，展開了獲得富裕的和文化生活的普遍的可能性，消除了農業勞動羣衆的貧困和窘急，引導鄉村走上提高經濟文化的廣闊的道路。「這時代早已過去了，當時我們的農業地區的鄉村，是毫不偶然地被稱爲「荒歉」和「災難」的。差不多有三分之一的農民，有時還要多些，他們永遠的，年復一年的，吃不飽肚子，也不可能舊制度下面打算改善自己的物質生活。」（莫洛托夫在聯共（布）黨第十八次大會上的報告）。

集體農莊制度引導鄉村走上富裕的和文化生活的道路。在一九三八年，集體農民的消費量，以每一人計，超過了沙皇俄羅斯時期的農民：穀與脫皮的穀類——二五%，馬鈴薯——八〇%，蔬菜與生菓——四七%，牛乳與乳製品——四八%，肉與脂肪——七九%，蛋——

三〇〇%。鄉村對於工業製品的消費量是劇烈地增加了。在基本上，集體農莊的公共收入和鄉村集體農民收入的增加，迅速地接近城市的物質水準。

每一個五年計劃，在改善工人、農民與知識份子的物質生活方面，都是跨進了一大步。在第三個五年計劃內，規定的任務是——提高人民消費量至一倍半，集體農民收入——一·七倍。按照收入增加的程度，和按照鄉村內商品交易的增加，在第三次五年計劃內所進行的，已經稍稍超越了城市。莫洛托夫同志在黨的第十八次大會上說：「這就在於適合蘇維埃政權所實行的使城市與鄉村居民的物質與文化生活水準逐漸接近的政治路線。藉以保證這個任務的實現，就是使作爲我們社會裡先進階級的工人階級，幫助好幾世紀以來處於更加低劣的物質生活水準的農民。」

在戰後五年計劃中，要使蘇聯人民的幸福更進一步的增進。幣制改革的實施，蘇聯盧布的穩定，配給券制度的撤銷，在物價大大抑低的基礎上面，國家與合作社商業的擴展，城市與鄉村之間的商品交易的發達，提高了城市與鄉村勞動羣衆的物質與文化生活水準。

克服城鄉對立的一個決定性的因素，就是鄉村勞動羣衆的文化和政治水準的向上，農民的加入科學和藝術部門，他們的政治水準的提高，他們的眼界的擴大。

在資本主義國家，教育爲剝削階級所壟斷。對於勞動羣衆，即在最幸運的場合，也只能享受爲資產階級所佔有的，那些知識的極小部分。

在沙皇俄羅斯，基本的佔有極大多數的居民羣衆，曾經都是文盲。鄉村裡的文盲所佔百分率更是特別的高。在社會主義建設時期，在我國完成了文化的革命。蘇維埃政權爲勞動者的子弟敞開了中等和高等學府的大門。在農業地區，一九三八——一九三九年學期內，就讀於不完全中學與中學的學生，超過了一千三百萬人。

蘇聯的社會主義的知識分子，不僅以畢業於中學和大學的人數來計算，而且以生產上的前進的人們來計算。

集體農莊的建設，是爲從農業勞動者中間準備熟練幹部的最得力的學校。新的技術和進步的蘇聯農業科學之在集體農莊耕地上實施，集體農民在共營經濟集團中的創造性的工作，在鄉村裡發生了大量的生產技術上的知識分子。農業勞動之普遍的機械化，在鄉村裡創造出龐大的工業類型的工人隊伍：自動耕耘機駕駛員、收割聯合機駕駛員、汽車駕駛員、機工、電氣工人、農場管理員、實驗員、技師、農學家、動員飼養家、集體農莊主持人、工作隊長、號令員。在集體農莊裡出現了幾十種新的職業，這是革命以前在鄉村裡所沒有和不能了解的。每一個城市裡，熟練的專家的隊伍日益增大，提高了他們在發展農業生產力上面的作用。

集體農莊的運動，徹底地改變了婦女在鄉村裡的地位，使千百萬的農婦參加了集體農業的積極的建設，提拔出數十萬婦女擔任領導者的職務。斯大林同志曾經指示，婦女在集體農

莊裡表現巨大的力量。

技術在農業方面的增進，精通這種技術的幹部的成長，證明了集體農莊農民在文化技術關係上一天比一天向上。

城市與鄉村勞動者的物質幸福與文化生活水準日益接近的最明顯的例子，就是我國社會主義城市與集體農莊鄉村的情況之徹底的改變。

資本主義的城市，表現出資本主義之特色的敵對的矛盾。資本主義大城市的最觸目的特色，就是除了那些整齊的中央大街——那裡住的是剝削階級及其付給高額薪水的奴僕——之外，還有破爛的陋巷，那裡塞滿了城市的貧民、無產階級。

社會主義在蘇聯的成功，全國的工業化，徹底改變了我們的大城市和工業中心的姿態。我們的城市是被變了樣了，在蘇維埃城市的改造過程中，消除了作為資本主義城市特色的那些缺陷。在蘇聯的城市裡，再也沒有舊時踞居着勞工們的貧民窟了。

「蘇聯由於革命的結果，這種破爛的街巷已經絕跡，而由那些新建的美麗光亮的工人住區——往往比城市中心還要美麗得多的工人住區所代替了。」（斯大林：「列寧主義問題」俄文本十一版四五七頁）

資本主義國家不肯為住宅的建築而化錢。蘇維埃國家則耗費巨大的資材，以改造舊的和建設新的城市，使它們整齊起來。

布爾塞維克黨和蘇維埃政府在一連串的決議案中保證建設新的城市和改造舊的。聯共（布）黨中執會在一九三一年六月的全體大會中，指出在農業地區進一步發展工業建設的必要性，通過了建設新城市改造舊城市的綱領。在大會的決議中寫道：

「考慮到更進一步的發展全國的工業建設，必須按照在農業區創造新工業基地的路線，以期接近城鄉對立關係之徹底的消滅，中執委會全體大會認為把大量的企業放在目前已經形成的大城市中心，是不適當的堆積。……」

鄉村在社會主義建設時期進行了根本的改變。斯大林同志在一九三四年的第十七次大會上說：「在舊的鄉村裡，最出風頭的是教堂廟宇，佔着上風的是巡官，神父和富農們的漂亮的房屋，後面是農民們的破爛草屋——這種舊式鄉村現在已開始消失了，它們日益由一些新式鄉村所代替；這種新式鄉村中有公共的經濟建築，有俱樂部，有無線電收音機，電影院，學校，圖書館和托兒所，有自動耕耘機，收割聯合機，打穀機和汽車。」

集體農莊把巨大的資金支付在大規模的建築、公共經濟建築和裝備、文化會堂、公園、養蜂場、池塘、工場和車庫供電站、住宅等等的建築上面。僅僅在一九三三年至一九三八年這一時期，國家就交付給集體農莊以十億盧布作為大規模建築的貸款。在集體經營時期，鄉村的住宅基金大量的支付於復興事業。數百萬的集體農民建造起自己的房屋。

鄉村裡的公共建築物 and 住宅的建築，一年比一年擴大。戰後五年計劃預定以集體農莊的

資金從事復興與新建築，並由國家幫助農民，給與三百四十萬所住宅，其中二百二十四萬所是給與以前遭受佔領的區域的。

現在已經存在這樣的集體農莊：這裡的生活幾乎已經和城市的沒有任何差別。在一系列的集體農莊裡，創造起來城市型式的公共的大企業（電力供應站、公衆食堂、浴場、洗濯所、俱樂部、戲院等等）；集體農民的房屋是整齊的，有着電燈照光和無線電收音機。

關於集體農莊整齊的實例，可是舉出基洛夫省伏士加爾斯克區的「紅十月」合作社。這個合作社是高度發展了的集體經營。在集體農莊裡具有兩所電力供應站，供電力爲二百基羅瓦特，帶着高壓路線十六公尺的掛鋸，四個旋盤，金屬削平架，有六千桶水壓塔的二條自來水管，磚瓦工廠，冶坊、磨坊、裁縫場、鞋廠、首飾廠和鎖廠，二十二部電氣發動機。在電力基地有着通車的高架鐵路，使打穀場和農場連結起來。在電氣設備的幫助之下，合作社在食堂洗淨馬鈴薯，切肉，剖別蔬菜，裝製罐頭食物。也都作爲工業的對象而從事工作了。集體農莊具有雙層的「文化之家」，有着三百個房間，在列別陀克河畔的松林裡有着自己的療養院，有強力的無線電站，有食堂和菜館。合作社建造了一百五十間漂亮的房子供給集體農莊的農民。所有集體農莊的全部房子都供給電流，其中大部分都有暖房、自來水、浴室、淋浴設備、無線電收音機、電話。

一九四六——一九四七年冬季，所有合作社的工作組長，都到莫斯科去受一個月的補習

教育，到狄米略席夫斯克農業科學院講堂聽講，這是在著名的農業專家領導之下的。有十二個小組在農業學院受專科的教育。在一九四七年內，集體農莊支付七千盧布爲講師的薪給。

早在十五年前，斯大林同志就指出：「城鄉間的對立性日益消滅下去。城市在農民心目中已不是剝削他們的中心了。城鄉間的經濟上文化上結合的線索日益堅固起來了。現在，鄉村經常由城市及其工業方面得到種種幫助：拖拉機、農業機器、汽車、人材和經費等等。而且，鄉村本身現在也有自己的工業，如農業機器站、修理場、集體農莊中的各種製造場、小型電站等等。城鄉之間的文化程度懸殊的深淵，是日益在填平了。」（斯大林：「列寧主義問題」俄文本十一版四五八頁。）

七 蘇聯城鄉關係的新面貌和新

內容

由於列寧斯大林的黨進行組織和教育的工作，提高了蘇聯人民——工人、農民、知識分子們的政治上的自覺性和意識，提高了他們向共產主義之路的自覺的努力。

「我們建造了社會主義的社會，這裡沒有剝削者的地位，沒有剝削的可能。新的高級的社會已經建立起來了。在我們社會上的兩個階級之間，在工人和農民——集體農民之間的關係，不僅沒有仇恨和不可調和的矛盾，而且，相反的，展開了按照生活條件、按照文化發展、按照他們對共產主義的努力而日益接近的過程。」（莫洛托夫語）

這首先表現在蘇聯人民對於勞動的關係上，他們把勞動看做自己對社會主義祖國的光榮的義務。工人階級、農民和知識分子的堅強的創造意識和勞動的積極性，在於他們在社會主義競賽的高潮中之切實的表現。這種競賽已經成爲真實的全體人民的運動。它動員起全體工作人員的體力和智力勞動。

集體農莊的鄉村跟着社會主義的城市前進，農業的先進和高度收穫的能手們跟着斯泰哈

諸夫工人前進，集體農莊農民們向工人階級看齊。農民勞動羣衆的精神風度也在集體農莊制度的基礎上根本轉變了。以前的農民，在文化和思想——政治關係上，是大大落在工人階級後面的。在社會主義建設時期，農民們已根本地改變了自己的社會的本性。

確定了集體農莊的社會主義的道路以後，蘇聯農民在黨的領導之下，有系統地提高自己的思想——政治水準，迅速地在自己的思想的發展方面追上工人階級。

在蘇聯人民反抗德國法西斯侵略的偉大的衛國戰爭時期，蘇聯農民特別明白地證明了自己高度的政治自覺性，自己的愛國主義。集體農莊農民在蘇聯軍隊的行列中參加作戰，保衛自己社會主義祖國的自由與獨立，他們也在耕地上和工廠裡奮勇地自我犧牲地勞動，向前線和城市提供糧食，向工業供應原料。

全體人民利益的高度的自覺，是社會主義的自覺，集體農民在戰後時期有了充分的表現。集體農民在一九四七年和在一九四八年寄給斯大林同志的信函裡，重新證明了自己的政治的成熟，自己爲鞏固集體農莊制度而不知疲倦的努力，以增加集體農莊的公共的財富，在任何氣候條件之下培植出高度的收成來。

高度的政治的自覺性，是集體農莊農民最重要的特質，它使他們和資產階級國家的農民完全不同。集體農莊農民在其文化、政治和思想水準方面，要比資本主義國家的農民前進得好幾個世紀，後者處於金融資本的壓榨之下，肩負着資本主義奴隸的桎梏。

集體農民的文化和政治的增進，他們的眼界的日益擴展，是奠基於社會主義生產關係在農村裡已佔優勢，和黨在農民中進行了大規模的政治教育工作的結果。

集體農莊制度根本地改變了蘇聯農民的生活狀況。農民在集體農莊制度下工作，不是孤立的小規模的經營，而是共同的、集體的，是大規模的、技術裝備的經營。他們相互間，彼此有最密切的聯系。他們共同的目的，是發展和鞏固公共經營，這是他們生活的基礎，他們為達成這個偉大的任務，而共同緊張起自己的力量來。

大規模的集體的經營，不斷地擴張蘇聯農民們的文化上和政治上的眼界，奠定了他們增進堅定性的組織力的基礎，改變了他們的心理。集體農民的行動，並不限於自己這個鄉村的範圍，並不限於自己的集體農莊。集體農民志在以全國為其活動範圍，他們積極地參加社會生活，表示對於鞏固自己的集體農莊和整個國家事業的關切。他們注意到黨和國家的內政和外交政策問題，研究這種政策和全心全意地予以支持。蘇聯的集體農莊農民和工人階級聯盟，並且在它的領導之下，參加國家的管理。

集體農莊建設的實驗，提供出大量的實例，證明集體農莊農民政治自覺性和文化水準的成長，證明農民心理上所發生的巨大的轉變。個人中心的心理，轉變為集體主義的心理。集體勞動產生了新的農民，他們用自己的智力和生活經驗，而謀公共的幸福。勞動在他們開始成為社會的事業，成為光榮的良善的和英雄的事業。

集體農莊農民的基本羣衆，對於集體農莊公共經營事業之鞏固與發展，表現其不斷的關懷，對虛偽的集體農民、對緩慢和落後、對反集體農莊、反國家的傾向，進行堅決的鬥爭。這在尼可拉耶，皮爾丟的戲曲「我們日常的口糧」中有着明白的反映。先驅者爲着集體農莊的鞏固，爲着合作社共營經濟的發展，爲着趕先與及時完成對國家所負義務，而進行作戰。他們克服了那些阻礙合作社共營經濟發展的敵對力量。「處女地」集體農莊的主席許拉，許留契、鐵霍依，是一個具有富農傾向的情緒的人，他企圖利用集體農莊以謀個人的富裕，在每一步驟上都欺騙國家，在集體農莊裡培養落伍者的情緒。鐵霍依狡猾地推行他的政策。他在外表上裝得很積極的樣子，而在事實上則分化集體農莊，剋扣國家的口糧，進行投機黑市。

「英雄，做了英雄，——鐵霍依說——但是，銀箱裡的錢還是令人心痛的。啊，這個。在我們這裡，市場是合法的！最後要出賣，而麵包還是要的。我記得：在麵包前面，雄狗也會伏伏貼貼的！」

劇本的作者反對現在集體農莊鄉村中的具有這種陳舊的富農意識的蘇聯人。「新路」合作社的主席馬利亞·費里樸夫娜·羅果娃不知疲倦點關心着合作社公營事業的鞏固。集體農莊在她的領導方式之下工作。羅果娃在及時地收穫穀類，繳清給國家，以及提高集體農民的生活水準，表現出她的精力。羅果娃以極大的熱情，能幹地切實工作，並且還夢想着將來

那些更加光輝和愉快的生活。她說：「在我們面前，開展着怎樣廣闊的天地啊！我生活得怎樣的豐富啊！而且，我相信：我們農地上的鄉巴佬的名字，搞出豐收來的收割人的名字，將要和戰勝敵人而名震遐邇的英雄們，耀目地並列在一起！他們也要被尊稱為英雄！」

集體農莊的鄉村，已經誕生了論千的社會主義勞動英雄。他們的功績是和前線的豐功偉績同樣被重視的。

在集體農莊的鄉村裡，成長了被注目的人們，他們在社會主義對於勞動、對於公共財產，對於國家的關係上，被視為模範。P·安格利娜的速寫錄「集體農莊土地上的人們」裡的前進的集體農民，就恰好地給證明了。在謝妙·巴巴雅夫斯基的小說「金星勳章」裡，描寫鄉村進步份子爲着鞏固合作社的公營事業的鬥爭，爲着反對落後情緒，爲着集體農莊的五年計劃的鬥爭。

在集體農莊的鄉村裡，成爲前進份子的人們是越來越多了。前進的人們，是集體農莊的黃金存款。他們在集體農莊的生活中吹起號音，引導落後份子，爲反對二流子而鬥爭，用全部力量來鞏固合作社的公營經濟。這是集體農莊農民在生活狀況和意識上進行了根本變革的最明顯的證據。

八 走向共產主義大道的蘇聯城鄉關係

在我國實行社會主義建設的過程中，根本地改變了它的經濟狀況，勞動羣衆的物質和文化水準，蘇維埃社會的階級構成，工人、農民與知識份子的生活狀況。工人、農民和知識份子之間的社會界限是消除了，這些社會集團之間的距離是一天天的更加縮短了。

集體農莊的農民，按照他們的精神的氣度和按照他們思想的進步來看，已經接近工人階級，但是在這些階級之間的差別，還沒有完全消滅。工人階級在國家大企業裡做工，這種大企業是澈底的社會主義的型式，具有全體人民規模的國家性的社會主義的性質，而農民則是在集體農莊裡做工，這些農業具有合作性的社會主義的性質。

在共產主義的條件之下，將沒有兩種社會主義所有制的形式（國家的和合作——集體農莊的），而將存在單一的所有制的形式——全體人民的、共產主義的所有權形式。這是要在用一切方法使國家所有權在國民經濟上所發生的重要的作用更加擴大的條件之下，無論爲國家的或爲合作——集體農莊的所有權更加鞏固之後，才能實現的，在共產主義的條件之下，將不再有工人、農民和知識份子的分別。

集體農莊的鄉村，很快地向社會主義城市看齊，但是它還不齊備管理城市的一整套。在模範性的農業合作社，生活已經和城市很少差別。這樣的合作社，建立得一年比一年增多起來了。任務就在這裡，是要在基本上發展合作社的公營經濟，使全部集體農莊達到先進的水準。合作社公營經濟的發展，將要達到這樣的程度：即要在全部集體農莊裡，都有整齊的住宅，供給電光、自來水、燃料供給所、暢通的運河、生活設施的企業、公園、文化之家，良好的鋪裝道路等等。有支線網的整齊的道路，有良好的修理工程的汽車運輸設備，運轉速度強大的客輪，在普遍的利用之下的航空設備，消除一切技術上的障礙，使鄉村的勞動者可以利用那些堆積在大城市裡的科學和藝術上的財富。在這一方面，我國有許多地方都已經實現了；不過，使鄉村勞動羣衆享受所有一切集中在大城市裡的文化 and 藝術上的財富這一個任務，尚未完全地達成。這個任務的徹底的完成，有待於生產力之更進一步的發展，運輸和城鄉之間的商務的發達。

農業在生產技術和勞動機械化方面，還沒有達到我們社會主義工業的水準。農業的勞動，還沒有完全地轉變爲工業勞動的「變種」。在工業方面，所有一切主要的勞動，已經實現機械化了；在農業方面只有耕種上的主要的勞動過程，業已實行機械化；至於農業上的其他的部門，現在還只有主要的勞動過程已利用電力的方法，開始實行機械化。現在的任務是要使農業上的一切勞動過程加強機械化而達到工業的水準。如此，必須擴大農業上的動力資

源，改善農業機械的類型，實現全體的機械化。在共產主義的條件下，農業勞動在機械化的水準方面，將和工業方面的勞動沒有差別。

靠了集體農莊制度，農業上的勞動生產力已經急劇的成長了，但是它還沒有達到工業方面的勞動生產力的水準。農業勞動之更進一步的機械化，所有一切農業部門的全體機械化的實現，電力的應用，保證將農業勞動轉變為工業勞動的「變種」，使農業勞動生產力接近工業勞動的標準。

城鄉之間對立性的完全的消滅，要求社會主義社會生產力之更進一步的發展，社會主義工業與農業之用盡各種方法的發展，農業之更進一步的機械化，集體農場公營經濟之盡心盡力的發達，農業文化的提高，穀類和工業用農產品收穫量的增加，公營畜產業的發展，集體農莊農民福利的增進。

農業的先驅者和高度收穫的成功者的經驗告訴我們：社會主義的農業，具有無限的可能性，以求生產力之全面的擴大，以求一切農產物收成的提高，以求公營畜產的發達。農業的先驅者的成功，他們獲得提高穀類收穫量至每公頃二〇——三〇%乃至更要多些，這證明農業上的並不遙遠的前途。

農業的合作社，奠基於拖拉機分配站的强大有力的技術上面，在黨和蘇維埃政府全心全力的幫助下，對於生產力的發展，對於集體農莊農民物質與文化水準的向上，具有無限量的

可能性，把全部農業合作社轉變為模範的全面發展的和高度商品化的經濟，這是社會主義建設上最重大的任務。

爲着農業的更進一步的向上，爲着豐富的糧食的創造，必須盡心竭力地提高農民的創造力和勞動的積極性。提高他們的政治的自覺，克服資本主義在集體農民意識中的殘餘。集體農莊和集體農民的利益，全體蘇聯人民的利益，要求對二流子、虛偽的集體農民，以及一切對勞動顯露其非社會主義關係的人們，進行決定性的鬥爭。

農業生產力之不斷的向上，農業勞動轉變爲工業勞動的「變種」，集體農莊農民的物質與文化水準的提高，他們的政治意識的成長，將使城市和鄉村之間的對立，完全地克服過來。

